

中国文化中的风景园林

山水之境

吴欣 主编

柯律格 包华石 汪悦进 等著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吴欣 主编

柯律格 包华石 汪悦进 等著

山水之境

中国文化中的风景园林



生活 · 讀書 · 新知 三联书店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2015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简体中文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山水之境：中国文化中的风景园林 / (美) 吴欣主编；(英) 柯律格等著. —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1
(开放的艺术史丛书)
ISBN 978-7-108-05071-7

I. ①山… II. ①吴… ②柯… III. ①园林艺术—中国—文集
IV. ① TU986.6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42133 号

责任编辑 杨 乐

装帧设计 蔡立国

责任印制 徐 方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100010)

网 址 www.sdxjp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制 作 北京金舵手世纪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15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2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张 16.25

字 数 205 千字 图 114 幅

印 数 0,001—5,000 册

定 价 49.00 元

(印装查询：01064002715；邮购查询：01084010542)

前言

在新近的国际学术研究中，许多大争论将矛头指向了西方文化对于自然、道德和美的理解中的一些根源性弊病。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识到，西方传统中有诸多因素，妨碍了对于树立一种新的世界观的必要性的理解；而这种观念的转换恰恰是战胜许多当代社会通病（比如环境问题、知识与道德分离）的关键。因此，许多学界人士纷纷把目光重新转向古老的亚洲文化传统，提倡从本土的视角来揭示人类不同文化发展的历史，力图将研究推向东方主义的局限之外。新一代的中国学者则以“破旧立新”为己任，不赞成对中国历史和文化做片面、平面的认识和描述。一方面，他们对前辈西方汉学家们对中国和中国人所持的偏见尤为警觉，并着重剖析导致其产生的根源；另一方面，他们迫切希望提升历史人文科学的研究水平，以成就一种对中国文化和历史更全面深入的理解。我编辑本书的出发点正是希望向国内读者介绍一些这样的有思想、高质量的成果和文章。这个想法首先是在2009年和2010年应邀为中国风景园林学会的《风景园林》杂志主持“山水百家言”学术专栏（中英双语，双月刊）的过程中形成的。专栏刊出以来，受到杂志社、广大读者和海内外学者、设计师、艺术家的大力支持，并期待有单行本面世。2011年，我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和作者们的大力支持下，从原有专栏文章中选用了7篇，并增补5篇从未发表过的新作和译作*，在此结集成书。

虽然话题纷繁，本文集意在山水，旨在呈现中国山水文化的丰富性和异质多样性。万物流转，唯有历史是中国人文化识别的根本。中国的山水文化很长很深，我们今天可争论可评判可借用，但切忌自己将自己的历史简单化。长期以来，西方学者因欧洲文艺复兴之故，往往比较关注相应时间段的中国历史，即14世纪下半叶以降的明清时期。这种片面地强调漫长历史中的一个短时期的研究方式，不可避免地忽视了中国山水文化形成发展的关键期——魏晋和唐宋，对正确理解中国文化是极其有害的。当今中国景观文化复兴的突破口就在于衔接历史与

* 其中朱利安（François JULLIEN）的文章《山水之神》，当时在专栏上发表的是英译本的中文译文，在此重新由法文原文直接翻译。

当代，而成就这种有机衔接的钥匙，首先在于对中国悠久的山水文化传统做出全面客观的研究。今天许多人习以为常的抽象的“自然”概念在古代并不存在，中国人历来视自然环境为具体化的“万物”：从风水到山水，从壶中天地到三山五岳，仅与人为设造的景观有关的词语就有囿、圃、苑、园、庭、台、村、庄、陵、园林、园亭、园墅、池馆、山池、山庄、别业、草堂、田园，药园子，果园子、菜园子……更不用说自然界的山水、林泉、丘山、风景、风光，山岳、山川、江河、湖海……要生硬地将这诸多的概念对号入座到英文中仅有的三个词 garden、landscape、park，不仅勉为其难，而且更反过来扼杀了中国文化的独特性、丰富性和复杂性。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一些欧洲、日本和中国学者，从建筑和花园史的角度，首先开始了对当时尚存的明清私人和皇家园林的系统研究，导致了国际上对中国古代造园艺术的高度赞美以及对其历史的极大兴趣。从西方文化的眼光来看，中国园林是对人类花园建筑史的重要贡献。今天以苏州园林为代表的中国园林当之无愧地被确认为世界文化遗产，对它们的保护与欧洲所有著名历史性花园同一级别。然而，这种偏重于维持现有园林建筑实体的方法是有代价的，它忽视了中国文化中对山水（自然或人工）深层含义的追求，甚至从人们记忆中抹去了一个事实：在中国历史上，山水观几经巨变，与文化的深层变化相映；而这种动态的世界观恰恰是中国自然哲学思想的根本。

本书中收入的 12 篇文章体现了一批当今卓有建树的中外学者们对这种情况的回应。他们各专注于一个不同的时代，从佛经、山水、园林、书画、赏石、小说以及他们的视觉和文字表象入手，来重新诠释概念化的西方思维系统难以穿透的、古老的中华文明。全书涵盖汉、魏晋、唐、宋、元、明、清各代，涉及艺术、文学、哲学、建筑、考古等诸学科，展示了中国山水文化传统的全貌。文集将填补目前国内这一新兴学科领域中的一个空白：一方面，近年来各大专院校纷纷建立景观设计和风景园林专业，社会各界积极参与绿化建设，有现代感的中国创意成为关注的焦点；另一方面，专业理论教学和研究中仍然缺乏高质量、有深度的学术文章。我希望本书的出版不仅可以为所有关心中国景观文化发展的人们提供批判性的参考，同时可以特别为高校专业教学提供一套便捷的辅助阅读材料。

作者们从新鲜颖异的角度对中国传统的自然山水观进行了全面的剖析，重点在于揭示和澄清中国文化本身对“万物”的理解——也就是在现代启蒙思想框架影响下开始接受西化的“自然”概念之前，中国人对山水景观文化的看法。这些观念在中国文化史上不断发展更新，从来就不是一成不变的。自古以来，山水就是中国文化之镜。从后汉到前清，可分为三个大的变化阶段：在魏晋南北朝生成；唐宋之际

逐渐成为文人个性的表达；元明清期间成为中华文化的象征。这种时间上的发展过程是本书甄选和组织文章的核心线索。本书由两个大部分组成：开篇的3篇文章为全书提供全景式的铺垫和语境，接下来的9篇论文注重对历史上不同时期独特的山水文化现象的研究。

第一部分的章节注重于对中西异同的批判性研究，以帮助我们理解对中国文化史的深入再理解之于反思西方思想的必要性。与其笼统地谈中西交流，应该具体地廓清在交流中人文、科学、经济等学科的分野，区别对之。一个最为常见的错误逻辑就是，因中西方在现代科学和经济中的共通性，而忽视中西文化的异质性，一起无条件地全盘接受（文化具体地说包括对历史、自然、社会、人文、道德和美等等的理解和思考）。与此相反，本书开篇的三个章节向我们揭示了，源于现代科学（在某种程度上是西方哲学的外延）的普适性的政治环境与文化假设，如何在近现代炮制了一个神秘主义的中国图像——不同于西方，中国永远重复着自己一成不变的传统。这种本质主义的、简单化的观点，实际上阻止了人们对中国历史的真正理解。纵观历史，华夏文化不仅源远流长，更是生机勃勃（比如，汉字并不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但却是今天仍然在使用的、活着的、最古老的文字）；虽灾害频繁，却能屡屡自我重整和更新。本文集关注的正是中国文化传统中这种变中求存的内在活力。英国历史学家柯律格（Craig CLUNAS）的文章从东西方全面交流、实力对比变换的19世纪切入，反思了西方人理解中国人自然观的困难，以及由此产生的误解。新兴的工业化的欧洲，将中国视为一个衰弱的躯体，僵而不死，一成不变，无法自我更新。许多这样的误解与西方现代文明伴行，至今仍然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接下来，两位法国学者朱利安（François JULLIEN）和梅泰理（Georges MÉTAILIÉ）分别从比较哲学史和比较科学史的角度显示了中西方自然观的巨大差异，解释了基本概念和分类的不同如何在中国及现代西方导致了截然不同的艺术和科学观。梅泰理由李时珍《本草纲目》入手来探讨中西传统上对植物学知识理解的根本不同，指出将科学与人文隔离的危险性，从而对“中国古代没有自然科学”的观点提出质疑。朱利安关于从王维到石涛的文人山水画的哲学基础的论述可以说是结构主义的，他所强调的山水画深层的中国文化根源，与相应的西方文化层面（欧洲文艺复兴以来风景画发展的因素）之间的比较，对我们今天理解环境有重要意义。这样，文集从一开始就向读者们清楚地展示了以西方理念为主体架构的现代文明强加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局限性——这不仅包括忽视中西方在“花园（garden）”、“景观（landscape）”、“绘画（painting）”、“雕塑（sculpture）”、“自然（nature）”、“空间（space）”、“时间（time）”、“运动

(movement)”，以及人与物的关系等基本概念上的歧义；同时也表现在将中国文化视为一个亘古不变的板块。

第二部分是本书的主体，注重于对中国山水文化自身独特性的批判性研究。中外作者们从许多不同的角度来揭示中国山水文化史的真面目，尤其是从原始材料和研究方法论上为读者指明了多个“新”方向：首先，今天越来越多的考古新发现迫使我们更新或改变原有的对中国文化和历史的阐释。第二，新的多角度、跨学科的研究方法能拓展我们对文化史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这不仅包括诸如宗教与政治、哲学与文学、社会与经济、个人与群体等，对视觉和园林艺术的影响；同时也包括艺术的反作用和自我能动性。第三，以新的研究视角来革新现有的理论架构。中国古代的许多概念，比如山水、园林、本草、经变、版画、书院、文人的丑石美学等等，在目前占主导地位的、基本的、以西方文化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人文学科语汇中很难找到可直接使用的词句。无法对号入座，不等于要削足适履；恰恰相反，作者们向我们显示了，这种情况为所有研究中国的学者提供了难得的机会——以历史性的、比较的（而不是盲从的）态度为宗旨，中国学者们各自从不同的学科领域出发，拓展和完善现有的学科体系。汪悦进（Eugene WANG）首先阐述了汉唐之际佛教的传入与中国本土观念相结合，对中国产生一种新的山水观的影响；姜波、包华石（Martin POWERS）、杨晓山（Xiaoshan YANG）、吴欣（Xin WU）四位作者，分别从考古和宗教、绘画和社会、美学和文学、哲学和建筑的不同维度，探讨了中国山水观在由唐到宋的历史分水岭时期的巨变。最后一部分，夏丽森（Alison HARDIE）和王毅从绘画和版画两方面将园林艺术在明代的高度发展与文脉相连，强调了二维艺术和三维艺术之间的对话。接下来的两篇关于清代园林的文章则展示了文学对深入了解中国山水和园林文化的重要价值：萧驰对红楼梦大观园的解读指向了空间的性别内涵，而石听泉（Richard STRASSBERG）关于康熙御苑在西方的传播的分析，则将读者带回到开篇对西方舆论中的中国园林的描述，为全书画上一个完整的句号。

一起，这本书的作者们为我们建议了许多中国山水文化学术研究的新方向，对中国山水文化史和景观理念史的研究——比如，思与物、德与美、古代对人与自然关系理解的变化及其诱因，等等——能够帮助我们放开眼界，跳出“园林”/“风景”/“景观”的樊篱，进入山水之境，以更为广阔的视野和心态来思考历史的文化价值，鼓励探索一条有本土历史文化感的当代景观文化艺术新路。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山水文化在今天完全可能比以往任何时代都丰富和生动。

最后，我衷心感谢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和《风景园林》杂志社（特别是编辑林广思、张健玲、李有为）的支持，使这些文章得以与更多的读者见面。除感谢所

有的作者之外，我还要特别感谢三年来参与过本文集和前述专栏工作的所有译者们：
傅凡、薛晓飞、卓立（Esther LIN-ROSOLATO）、钟惠城、杨云峰、赵彩君、秦柯、曹
曼青、牛牧簪、季婉婧、南楠、王劲韬。

吴 欣

2012年春末于美国威廉斯堡，寂然不动轩

目 录

前 言	吴 欣	1
01 西方对中国园林描述中的自然与意识形态	柯律格	1
02 山水之神	朱利安	15
03 探析中国传统植物学知识	梅泰理	31
04 灵异山水——从“东汉之图”到“西域之变”	汪悦进	42
05 唐东都上阳宫的考古发掘与研究	姜 波	102
06 中国园林中的政治几何学	包华石	114
07 石癖及其形成的忧虑——唐宋诗歌中的太湖石	杨晓山	131
08 儒家山水——从风景园林到格物致知	吴 欣	142
09 版画与园林		
——中国古典版画与中国古典园林艺术的关系	王 毅	180
10 明代晚期中国园林设计的转型	夏丽森	214
11 大观园——美人繁花的庇护之所	萧 驰	225
12 一座清代御苑之传播		
——康熙《御制避暑山庄三十六景》及其在西方的传播历程	石听泉	235

01 西方对中国园林描述中的 自然与意识形态

Nature and Ideology in Western Descriptions of the Chinese Garden

[英] 柯律格 (Graig CLUNAS)

导 读*

柯律格现任英国牛津大学 (Oxford University) 艺术史教授, 着重于对中国艺术, 特别是明清时期视觉及物质文化的研究。因在中国文化和艺术史研究领域的卓越贡献, 他 2006 年被选为英国学术院院士, 2012 年应美国国家画廊之邀主讲第 61 届“梅隆系列艺术讲座”。他的主要著作有:《长物: 早期现代中国的物质文化与社会状况》(*Superfluous Things: Social Status and Material Culture in Early Modern China*, 1991),《大明帝国: 明代中国的视觉与物质文化》(*Empire of Great Brightness: Visual and Material Cultures of Ming China, 1368-1644*, 2007),《明代的图像与视觉性》(中文版, 2011) 和《雅债: 文徵明的社交性艺术》(中文版, 2012)。

本文探讨从 18 世纪下半叶至 20 世纪上半叶西方文献中关于中国园林的文字记载; 其研究的重点不在于园林本身, 而在于当时欧美主流出版物中就园林所作的诠释。读者应该尤其注意的是: 这些 19 世纪西方文献描写的主要是明清江南园林和清代皇家园林, 对中国更广义上的山水文化 (如名山大川和人文古迹等) 鲜有触及; 其中“自然”一词往往被普遍地等同于一个无差别的、概念化的、单一的“中国园林”。另外, 对一个多世纪以来漫长而复杂的文化变迁层分缕析, 必须依赖大量的原始文献来重现历史的真实; 而许多 19 世纪的语境中对中国人和园林的描述在今天看来充满了误解 (甚至歧视)。对此, 作者开篇即批判性地指出: 这些言论本身就是西方殖民主义的东方主义文库的一部分, 读者必须以历史性的眼光来阅读。在早期 (17—18 世纪) 西方传教士们——如法国耶稣士王致诚 (Jean Denis Attiret)——的文字记载中, 中国园林被推崇为以人工模仿自然的典范, 是一门关于不规则性和自然形态的至高艺术。在此后的近百年中, 这一认识在诸多作者, 包括坦普尔斯 (William Temples), 钱伯斯 (William Chambers) 等人的文章中得到持续的回应。19 世纪上半叶, 清王朝与欧洲列强之间力量对比的变化导致了西方对中国和中国园林的重新诠释。文章揭示了在 1850 至 1950 的一百年间, 西方关于“自然”与中国园林关系的态度发生了根本逆转, 由全盘肯定转为全盘否定。导致这一逆转的原因, 在本质上不是对中国山水园林理念了解的深化, 而应纯粹归咎于西方文化本身对其所认可的自然观定义的改变。通过对大量史料的剖析和解读, 本文为更全面、广泛、深入地思考西方意识对中国现当代社会的影响, 提供了有益的启迪。

* 全书每篇文章前的导读均由编者吴欣撰写。

对于最早记录其对一座真正的中国园林的看法的欧洲人来说,“自然”绝不会是命题的一部分。1599年,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在南京参观了魏国公徐弘基的私家园林。园林的设计错综复杂,巧夺天工,给利玛窦留下了深刻印象,“厅、堂、亭、塔、院落和其他堂皇的建筑物”,都由“一座人造假山俯临,这座假山打满孔洞,并配备有廊子、台阶、小室、凉亭、鱼池和其他设施”。^[1]在利玛窦的笔下,这座私家园林宛如一座迷宫,“当你步入另一扇门前,得花上两三个小时才能游览完每处地方”。尽管利玛窦不想在参观中国某一特定场所时,特意去探寻“园林文化”和“自然”之间的关系,但是他曾熟读普林尼(Pliny)和西塞罗(Cicero)作品,非常了解欧洲关于“园林文化”和“自然”之间关系的各种争论。^[2]然而,他可能还不知道在他来中国之前的五十年里,中国园林建筑的侧重点围绕着不同的两个方向进行了重新调整,一方面是将园林风景作为富饶多产的林果业的拟态;另一方面,与之相对,则是将园林当作视觉化构成的场景,忠实于绘画布局的形式法则。这种两极化倾向一直充斥于中国园林论述中,即使在整个清代都没有完全消失,当然它并不是本文的主题。^[3]而笔者对中国园林之于国外造园的可能性影响也不感兴趣。本文研究的对象不是中国园林,而是欧洲人和美国人对中国园林的论述。这些论述本身也是大量东方主义文献的一部分,其中,“自然”一词被本质主义地使用,与“中国园林”别无二致,而且对“自然”的这种用法总是或多或少地指向中国的“本质”(即根本的、不变的特性)。因此,我主张,将关于中国园林的各种争论,置于帝国主义全盛时期以及之后的中华帝国与欧美意识形态交锋的大背景之中,具有重要意义。我们有必要了解比大部分作者所处年代更为早远的论述,而这些论述对后来的写作者来说,仍然是一个未经审视的历史阶段。笔者试图展示西方作者对中国园林中“自然”的态度如何在1850至1950的一百年间经历了完全转变,以及为何这种转变与人们对中国造园思想理解的提高没有多大关系,而纯粹是缘自欧美人论述中对“自然”概念解读的变化。

耶稣传教士经常出入宫廷,他们是在18世纪将中国园林文化带到欧美地区的首席传入者。这方面传播最广泛、最有影响的文字无疑是王致诚所著,他于1752年翻译并出版了独立的短篇作品,从而为当时的英国读者所熟悉。在《对于北京附近皇家园林的特写》(*A Particular Account of the Emperor of China's Gardens near Peking*)中,出版商采用了王致诚给一个巴黎记者的私人信件作为装帧图案,其中有这么一段:“我特别感谢您送给我的画满花草的盒子,它安全地到达了;但是我请求您以后不要如此破费;因为中国人在制造这类产品,

尤其是假花方面，远强于欧洲人。”书的脚注加强了这些稀奇玩意儿的逼真虚幻效果，“它们与真花如此相似，以至于人会驻足停留，嗅闻花香。”^[4]

王致诚的这本著述经常为学者们所引用，而这段客气的开场白却很少被学者评述，若将它与书中被引用率最高的一段话放在一起的话，便可读出其中的趣味。在强调了皇家园林与欧洲园林的不同之后，特别是“规则直步道”和“各种蜿蜒小路”的对照之后，作者继续说：“在这里常常可以看到郁郁葱葱的林木，尤其是花树，点缀在高低起伏的小山上。水道和小溪的侧壁不是像我们这样用光滑的石头砌筑成直线形；而是采用大小不一的石头堆砌而成，这些石头有的向外凸出，有的向内凹陷，其粗糙的纹理看起来更具质感，巧夺天工，会让你以为这就是自然之作……小花散开在河岸上，有的穿过山石的孔洞，好像它们是自然生长在那里。”^[5]

对王致诚来说，中国园林是一个过多用人造物来营造自然景象的场所，就像那些花儿逼真得会让你试图去嗅它们，石头的布置也颇显艺术感，看起来宛若天成。这里运用的主题可在其他 18 世纪有关中国工艺的描述中看到：这是一种复杂繁琐的工艺技术，它产生了真实的幻象，但是也经常游走于俗艳的边缘。在东方学寓言中，最巧妙地阐述这个概念的是安徒生的童话《夜莺》，它基于其写作时代所广泛流传的对于中国的印象，即在中国人的主观意愿中，复杂和人工比简单和自然更胜一筹。中国工艺不是“粗鄙”，而是高度精密。另一个倾向则是将自然等同于不规则性。在兰格（Willy Lange）和罗宾逊（William Robinson，1838—1935）^[6]的著作中，即使未阐明也暗示了后达尔文主义的观点，即自然式园林是一个本土植物的乐园，这在王致诚和其他旧王朝时期作者对中国园艺的表述中是看不到的。确实，王致诚对园林的讨论很少关注树木，尽管他有一篇同时代的中国植物的学术论文，但是不涉及园林营造。^[7]从 17 世纪晚期的坦普尔斯（William Temples）爵士到 18 世纪早期的钱伯斯（William Chambers）和后继者，“自然式”中国园林的标志是人工设计的不规则式。这种态度出现在例如丹麦地理学家马特-布伦（Conrad Malte-Brun，1775—1826）的著作中，他认为这种对自然的模仿太盲目，因为不规则图式只与没有经过改变的中国风景相匹配。

“如果他们（中国人）已经认识到了他们的园林布置和他们的田地分布中的美，这是因为他们以一种奇特而充满画意的形式精确地复制了自然。突出的石头，好像随时有落下的危险，桥悬于深涧之上，矮小的冷杉散植于陡壁，还有平湖、激流、飞瀑，以及在这个大杂烩中竖起的锥状宝塔，这就是大尺度上

的中国风景和小尺度上的中国园林。”^[8]

在 19 世纪有关中国园艺的论著中我们将看到，这种将土地的自然起伏和田地所有权分配上内在的不均等强力对等的现象，更明确地呈现出来。

王致诚所处的年代与 1824 年劳顿 (J. C. Loudon) 的《园艺百科》(*An Encyclopaedia of Gardening*) 第二版相隔了八十多年，这几十年中政治和意识形态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最重要的是英法之间在亚洲政治势力范围上的争执以英国的受益而停息。英国商业利益日益要求中国“开放”，与他们进行贸易。这种高涨的意识形态热情甚至可以在一本与政治主题无关的造园书中感受到。

^[9] 劳顿开头写道：“尽管已有人对中国造园进行撰文研究，但我们对于中国造园的知识仍所知甚少。我们并非完全明白，波斯和印度园林与中国园林的差异如相关著述所说的那么大。很明显，中国人在叠石时学习了不规则性并模仿自然；但是这种模仿是否达到了树林、水池、地形所应有的程度，这种模仿是否是由那些如 William Chambers 爵士提炼的中国人的原则所指导，看起来非常值得怀疑的。”^[10]

除了评论叠石的创作之外，劳顿甚至对中国人有意义的模仿自然的智慧提出了质疑。孔特 (Le Comte)、奥斯贝克 (Osbeck)、王致诚和钱伯斯等上个世纪的作者对中式园林非常感兴趣，而劳顿对此却表示蔑视，甚至进行攻击性评论。他甚至引用了 1793 年担任英国驻清帝国大使马戛尔尼 (Macartney) 勋爵的话。勋爵当年的威望非常高，曾经去过中国，劳顿很清楚这一点。^[11]

劳顿第一次说出了他所知道的 19 世纪英国著作的主流思想。中国人不仅对于自然冷酷无情，而且他们还与自然进行对抗：“改善自然是我们的杰出之处；中国园匠的特点在于征服自然：他的目的是改变他在自然中发现的一切。他用树木装饰一块荒地；用河湖浇灌不毛之地；在平地上堆山，挖凿山谷，排布各种建筑。”在下一页书中，劳顿直指中国园林本质上的不合常情：“几任大使之后出版的英文著作关于嫁接和扦插的繁殖方式、矮化树、重瓣花、怪异的搭配和其他各种造园手法的描述，都是征服自然的表现。”前后矛盾的是，劳顿接下来又抨击中国园艺不懂嫁接工艺，^[12] 而嫁接对他来说完全是毫无问题的“自然”行为。关键不在于他确实完全错了（嫁接那时已经被应用了几个世纪），而在于他所挑拣的所谓“自然化”的人类干涉行为。对此，“自然”完全是意识形态的产物，一个东拉西扯的对象，和任何事物（甚至“人类”）一样强有力地擦掉了它创造的痕迹。

荒诞怪异的人造物、不忠实于自然的不规则性是中国园林的基本特征，这

对劳顿笼统的评述来说非常必要，因为这为他“在不同的政治和地理环境下造园”的言论打下基础。他根据19世纪早期自由政治经济学的术语标准将政体分成两类。早期的政体是专制的，“适于粗鲁和无知的年代，那时，处于蒙昧之中的人类由国王统治，就像孩子被父母管教一样。”理性的政体则是人们由法律构成的体系所统治。理性和自然现在同一意思。他接着说：“在自由的地方，最有利于展现各种类型的造园。每一个自由的政府和社会的最终趋势是财富聚集在不均等的群众阶层手中，就像自然已经分配好它的特性；而这种不规则性有利于促使园艺成为一种既是人类所需，又能带来便利的高雅艺术。”^[13]对于劳顿时代的英国思想家来说，教科书对“专制”的定义带有贬义的倾向，他们还认为中国没有保护私人财产的意识。其实这是不正确的，然而这也是孟德斯鸠、亚当·福格森以及马克思等西方学者对中国认识的一个前提。他们认为中国仍处于“蒙昧状态”，必然不会有合适的或者优雅的艺术繁荣，尤其是依赖于土地所有者见识的艺术，比如要有像当代风景园林师雷普顿（Humphry Repton）那样开明的赞助人。

劳顿1834年的修订版编于鸦片战争前夕，当时英国军队试图用大炮把处于蒙昧中的中国打醒，修订版总体来说扩大了园林史的比例，其中也包括中国的内容。结果却是再一次通过所谓不可辩驳的证词，加剧了对中国园林的诋毁。其中最主要的是一位Main先生，他用下列词汇描述了一位广东大商人的花园特点，“毫无意义的错综复杂……可笑的怪异……故意的不规则等”。这座花园被定义为一系列的缺失，“没有装饰布置的余地，没有理性的设计，整个是一个非自然群体的不协调组合。”^[14]在这里，非理性一定是与自然相反的。劳顿接着在一段充斥着古典东方主义的段落中，强调了不合理的园林与其建造者——非理性的中国人之间的联系：“因此看来，中国人在造园上的品位带有民族通性，造园的品位由他们的首要特征——怪异所决定。对古怪和荒诞事物的追求，往往很难跟生活在开明与自由国度中的人们联系起来，他们更多地会喜欢简单的事物。”^[15]一事物如果要看起来自然，它不但必须是理性的，而且必须是简单的。

对很多19世纪的作者来说，中国园林不自然、不理性并且过于复杂，而这其中关键的展示品便是矮化的树种，在英语中通常知其日本名字为bonsai（中文：盆栽或盆景）。虽然18世纪人们就已知道盆景，但是在19世纪对它有更多的关注和兴趣。署名缩写为W. L.的作者，曾在1846年11月21日的《园丁记事》（*Gardener's Chronicle*）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式的矮化树》的文章，

对盆景进行广泛讨论。作者提及最近的中国战争，并且说明他的论文是基于一个法国商业考察团成员的叙述，这个考察团希望中国能够接受他们提出的贸易协议，而这次战争正是企图使这份协议的兑现成为可能。^[16]作为典型的仇法者，W. L. 嘲笑了考察团的失败后，又描述了广东一城市的节日市容：微缩的树木成为街道的装饰品。“这些小树的枝条被扭曲了，发育不健康，有的树皮都脱落下来了，看起来挺可怜……”于是他得出以下结论：

对中国人来说，没有什么是美丽的。反倒是那些枝条扭曲、光秃秃的小树才是奇迹。它甚至可以跟宇宙中的森林相媲美。所以中国园丁的主要职责是战胜美丽富饶的自然。这并不只是体现在他们修剪这些树枝的经历，而在于他们与自然之间的斗争，包括丑化自然创造的美丽物种，扭曲原有那笔直美观的外形，使其丧失生机而呈现病态。^[17]

整个描述都是围绕折磨的比喻展开，即一个恶魔般残忍的中国花匠交替折磨和救活不幸的植物。于是，中国人对自然的态度显露了他们天生的残忍。在这里，“自然”意味着植物。

与对种植的关注相反，人们对于中国园林设计的兴趣直到 19 世纪 80 年代才重新出现在欧洲的资料中，那时它是厄那夫（Ernouf）和阿尔方（Alphand）所著《园林艺术》（*L'Art des jardins*）的一个章节的题目。《园林艺术》是一本普遍主义“园林史”的开创性著作。提到“黄种人”创造“不规则园林”的先例时，作者评论说：“有能力的作者在这些园林中，看到了复杂而变化莫测的中国建筑映射，一种植被化的建筑的延续。我们也会心甘情愿地在园林中看到他们对祖先所居住的山地的传统回忆。”^[18]

于是一种精细的（然而完全是凭空臆想的）有关民族记忆的理论便产生了。它认为中国园林的假山设计，是试图引发人们对于被视为中华民族发源地中亚群山的联想。

尽管这项研究声称包含了花园史，但是内容非常不完整，从大约公元 1000 年前商代的最后一位暴君那半神话的放纵（碰巧发生在猎苑中）跳跃到基督教士张诚和王致诚的叙述。后者被广泛引用并常被指责过于热情，特别是毫无根据地赞扬皇家园林的“自然”。援用缠足的传统，东方学者迷恋于不正常的性别特征和折磨。厄那夫和阿尔方宣称：“中国对待山石、树木和溪流等等的态度就如同他们对待妇女缠足一样。中国风格的风景对于香格里拉之风光就如同

诗篇中的离合诗。”^[19]缠足这个比喻不经意间暗合了同一时期罗宾逊（William Robinson）在1883年发表的关于英国花园设计的经典文献。其中他在坚决反对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修剪的紫杉树篱时说过：“我们有什么权利把这么可爱的造物变形成这样？没有比中国人缠小脚和故意野蛮地扭曲树木那美丽的原型更愚蠢的事了。”^[20]笔者认为，我们可以从罗宾逊对中国花园的态度推断出他们同时代人的大致立场。

此外，法国作者通过中日园林的比较，引入了一个新主题，来详述中式园林的缺点。透过这个时期日本风格的标准（刚好艺术花园也在此期间出现），我们可以在各种艺术形式中发掘出一个充满活力、未被发现的日本，与腐朽、疲惫且人尽皆知的中国形成对比。^[21]这里的表述是：“虽然受到中国那样失常的品位的影响，日本人似乎天生就有着高超的艺术品位。他们很好地在1878年的法国展会上说明了这一点。”日本花园鉴赏文献数量的不断增加，与有关中国花园的讨论形成鲜明对比。

与劳顿所处的年代相比，英国人对19世纪末他们所控制的亚洲势力范围感到满意，对中国园林的论述也没有像劳顿那样的尖锐性指责。然而，中国园林的意境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在对自然的执著追求之下产生的。1890年1月25号的《园丁记事》，摘选了温菲尔德（Lewis Wingfield）所写的一本叫做《环球快马的漫游》（*Wanderings of a Globe Trotter*）书中对一个花园的评述：“炉渣及粗糙石块组成了奇形怪状、迷宫般的假山，从而将花园的高低错落进行不同层次的分割，还有各种的水池和溪流，或者说是流着污水的水坑和排水沟。园丁似乎把自己的任务定位为能够创造出多少跌宕起伏的地形，多少有趣的小桥和不知通向哪里的小路。”^[22]六年后同一杂志还写道：“亚洲园艺的形式，同旧世界的西方国家差不多。而给西方人留下印象的则是中国和日本通过千奇百怪的造型、繁文缛节的手法以及极端的人为造物来达到预期效果。这种不同寻常的技巧，可以从扭曲的针叶树体现出来。”

在这里，我们可以从接受不同国家的不同“形式”中看到一点文化相对论。并且，这里对矮化树木的技艺更多的是欣赏而不是责难（当然也没有暗指“折磨”）。取而代之的是我们读到了“耐心和小心翼翼的东方园丁”这样的字句，并使读者想起在以前由著名的伦敦园艺师维奇（Veitch）组织的坦普尔园艺展上展出的针叶树盆景带来的积极反响。^[23]

正是在这几十年中罗宾逊关于更加“自然”的花园的想法被传播并开始为人所接受。^[24]然而，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植物探险活动也是在这些年里更频繁

地展开，使得更多的植物材料从亚洲迁移到欧洲和美洲。记载皇家园林学会历史的一项标准化工作指出：“另一种情况是在罗宾逊及杰基尔（Jekyll）小姐的帮助下，中国敞开大门，特别是对英国的植物收集者，于是各种耐寒的新植物品种便陆续到达英国，经过罗宾逊的改良之后，适应了当地环境，并使英国的园艺面貌焕然一新。”^[25]也正是在这些年中，像威尔逊（Ernest Henry Wilson, 1876—1930）这样为英国和美国的商业和学术组织工作的植物企业家，踏遍中国西部四川省的各个角落寻找自然界中的新奇物种。

这个时期的园艺文献把威尔逊塑造成一个有英雄气概的先驱，疲于与狡猾的中国雇员斗智。一份1917年出版报道称这些中国制造商的助手，居然挖空心思，想以高价向威尔逊销售假冒伪劣的植物标本。报道还援引诗人哈特（Brett Harte）种族主义的观点来总结所谓普遍公认的中国人的心灵本质：

黑暗的手段，
徒劳的伎俩，
是不信教的中国人所特有。^[26]

将中国人的人为造假行为与阿诺德植物园的代理人对自然的探求形成鲜明的对照。

这是一个有力的讽刺，东方学研究的其他领域也有类似的情况。中国艺术的原理需要西方学者阐明，所以中国的自然需要从中国园丁手中拯救出来，因为这些荒诞的园丁带着人造物进入自然，毒害自然。在东方备受折磨并面临退化的茶花可以运送到霍姆郡，以庆祝大英帝国的势力范围在全球的扩张，这显然是不成问题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918年发表在《园林杂志》（*The Garden Magazine*）上的一篇充满怨言的文章。那时候大部分的英美以及北欧的业余园丁都深刻地认识到依靠本地植物的必要性。哈格曼（G.L.Hagman），一位来自上海附近的外籍人士社团的成员在文中抱怨道：“我们读了《园林杂志》后受益匪浅，造园是我们除了年复一年的与家人共享食物以外的爱好，它为我们自己和病人提供花卉。我们不断看到威尔逊在中国的‘发现’，并希望我们可能从他及其他人的科学探索中获益。是否有这样的一份报告，让我们可以了解中国那些有价值的东西的具体位置？或者有没有相关信息让我们可以找到这些东西？如果他给这些东西起中文名字，这将会有助于在中国保护这些珍贵的物种。”